
少数民族地区农户 对旅游发展的福利感知研究 ——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刘德光¹ 王朝举^{1, 2} 刘玲¹¹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3;

2.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发展迅速,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农户的生活水平;然而,旅游活动的开展也干扰了景区居民的正常生活,甚至还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以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农户福利评价体系并确定权重,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测算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对当地旅游发展的福利感知水平,由此可知,肇兴侗寨农户对“心理状况”的评分最高;对“公共环境”和“居住条件”评价中等稍偏上;对“经济条件”评价一般;对“社会机会”评价最低,处于“不满意”水平。分析其原因并探讨肇兴侗寨农户福利的提升措施,对旅游社区的民生建设及乡村振兴有着极大的意义。

【关键词】:旅游发展 农户 福利感知 福利提升

【中图分类号】: (C9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05-088-093

一、引言

福利是幸福和利益,反映的是个体的主观满足感和资源占有状况。^[1]与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相比,旅游发展为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环境、增进农户整体福利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物价上涨、自然环境改变、社会关系更加复杂等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研究农户对当地旅游发展带来的福利感知状况与提升措施:它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前景,更是当下改善民生与振兴乡村的关键点。本文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选取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寨为样本点,以福利体系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户对当地旅游发展带来的福利感知,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旅游社区农户福利的提升措施,以期旅游社区的民生建设及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二、评价体系构建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旅游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倾向及动态调试”(17BJY153)。

作者简介:刘德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旅游市场营销;王朝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文化旅游;刘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乡村旅游。

(一)福利的构成

福利是一个涵盖多维度内容的复杂范畴,早期的研究多以经济收入作为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福利的研究维度得到不断扩展。功利主义效用福利理论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但这一理论无法充分反映自由、权利、健康等潜在因素对福利的影响,并且由于个体差异,人与人之间很难直接比较效用;客观主义福利理论则是“物质论”,^[2]但它体现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福利,大大简化了福利的内涵,仅仅体现的是个人所拥有的物质数量的差异;上述两种理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20世纪80—90年代,阿马蒂亚·森提出,可以依据人的功能和能力来描述个人福利,^[3]45—55它认为个体福利由健康的身体、良好的教育、稳定的工作、必要的闲暇时间等活动组成,^[4]而个人的能力决定了这些活动的实现程度和方式,以及个体福利水平的好坏。

(二)农户的福利评价体系

工业化、城市化所引致的社会转型不仅使农户的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也影响了他们的福利构成。已有文献对于农户福利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关注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部分研究将福利分为主观福利和客观福利,客观福利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来衡量,佐证征地对农户收入和支出的影响,主观福利用幸福感和自评健康来衡量,考察征地对农户身体健康和整体幸福感的影响。第二类文献聚焦农地抵押融资行为对农户福利产生的影响。这类研究认为家庭收入、消费支出、耕地面积、经营类型、总资产、社会网络、贷款经历等指标是影响农户福利变化的主要因素。第三类文献侧重研究退耕还林、农业补贴、资本下乡等经济手段产生的福利效应。退耕还林项目中采用人均收入、生活质量、健康、环境安全、社会关系等来测量农户的整体满意程度;农业补贴中采用直接补贴(通过发放农业补贴金增加的农户收入)、间接补贴(通过补贴农机、化肥、农药、种苗)对农户福利影响;资本下乡中则通过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生活条件、景观环境、心理因素等指标考察组成农户福利的功能性活动。

农户对旅游发展产生影响感知的测量主要从经济收益、社会收益、经济成本、社会成本、环境成本五个维度来测量;还有学者从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环境效应三方面测量。从事乡村旅游研究的学者从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社区环境、发展空间、心理状况六方面来进行实证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农户福利感知情况。研究民族村寨旅游的学者则认为社会文化、经济影响、旅游政策、传统观念这四个方面是影响居民旅游感知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学界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逐渐增多,从贫困居民的视角来进行旅游扶贫的满意度评价发现,经济条件、生活水平、扶贫参与及收益是贫困居民最关注的三个方面,医疗健康、社会和谐和公共设施次之,教育条件、生态文化这两者排在最后。

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结合旅游业特点,笔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对旅游发展的福利感知效应应当从经济收入、居住条件、公共环境、心理状况、社会机会这五个方面衡量:

1. 经济收入。从微观视角考察农民福利得到,收入确实对农民福利有着重要影响,然而却出现收入个体化差异与主观福利普遍较高并存的现象,也就是说不论收入高低,农户对福利状况的主观评价普遍较高,这表明收入并不是影响农户福利的唯一因素。^[5]对旅游目的地来说,旅游业不仅能促进以娱乐、餐饮、住宿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还能拉动民族地区以农牧业为代表的的第一产业发展,增加了农户的可支配收入,使其整体福利水平得以提高。^[6]尤其是在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的综合效应突出,以旅游收入对地方GDP、财政收入以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旅游收入与宏观经济指标GDP相关性最大,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增加直接就业岗位的同时,还通过刺激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多间接就业岗位。^[7]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都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其中,经济状况的改善最为明显,它让农户从低收益的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从事旅游经营,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8]

2. 居住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户更倾向于居住舒适干净、宽敞明亮的楼房,对于发展旅游的民族村寨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应当注意到旅游业发展中的一个悖论,尤其在民族旅游中,游客追求的异域风情和民族特色与当地农户对现代化生活

的极度渴望之间产生了很大矛盾。发展民族村寨旅游的根本目的是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提升农户的可持续生计能力，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居住条件的改善是必然，但是居住条件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民族文化尤其是建筑文化的流失，而文化折损到一定程度便失去吸引力，游客失去兴趣，便开始寻找新的景区。总之，旅游发展必然会影响到周围农户的居住条件和外部环境，并且人均居住面积大小与房屋的舒适程度息息相关，房屋结构则反映的是住房品质的好坏，这两个指标对居住功能的实现都有正向影响。^{[3] 45-55}

3. 公共环境。公共环境中的空气环境、水环境等自然资源状况与社区文化氛围、公共基础设施等共同影响着农民的福利感知。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建立游客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便利交通，方便本地城市游客及外省、外国游客的安全抵达。空气环境、水环境及其它生态环境是反映旅游目的地整体环境质量最直观的因素，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公共环境，所以说，旅游发展对生态环境也有一定的美化作用，倘若旅游开发之后还能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地管理，便能使当地生态环境进入良性循环。另外，食宿、购物、娱乐等作为旅游六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开发中必须要考虑的因素，这些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能提高当地农户生活的便利程度。对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来说，社区文化氛围本来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是对其进行旅游开发的初衷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发展不仅会带来这些正面影响，也会给公共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旅游资源破坏、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侵蚀等，游客以及商户的进入还会影响当地的社会治安。空气质量、水体环境、自然景观、社区治安、基础设施、社会文化氛围这六个二级指标可测量农户对公共环境的感知状况。

4. 心理状况。幸福感是一个人所获福利的重要内容，它影响到人们对其他福利内容的感受和评价。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及留守老人问题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国家新生力量的成长，更体现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是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旅游作为一项综合性产业，不仅吸引了大批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就业，特别是给留守妇女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她们实现了就近就业，甚至是创业，在服务行业中发挥了她们的专长、提高了家庭地位；青壮年不再外出打工、远离家庭，也让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状况和留守儿童的成长教育问题都得到有效提高和缓解，这对维系和睦的夫妻关系及家庭关系、提升心理幸福感有着重要意义。另外，旅游发展还有利于增强农户的社区归属感，这些归属感大多源自旅游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比其他社区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多的发展机会；反过来，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又能增加农户对旅游业的支持度，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这里将农户的心理状况列入进来进一步验证并补充上述有形福利的评价结果，并用幸福感、家庭/夫妻关系这两个二级指标来测量农户的心理状况。

5. 社会机会。社会机会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社会联结度，一般而言，农民的社会联结度越高表明其社会活动能力越强，其获得的福利就越多。乡村旅游作为农村地区内生发展的路径之一，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通过其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为乡村社会注入新的元素，并对原有的乡村秩序产生冲击，甚至是重塑，使乡村秩序发生变迁。^[9] 调研中也发现一个普遍现象：村干部、乡村经济精英及乡村政治精英经营的农家乐客源比普通农户的客源要多得多，其中有地理位置、服务质量等客观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其比普通农户拥有更多的社会机会，这些社会机会给他们带来了更多客源。反过来，旅游发展也催生了不少社会机会，如外来游客的大量涌入开阔了村民的视野，让他们零距离与大城市的居民接触，通过与外来游客的不断交流，一方面拓展了他们的人脉关系，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发现了更多商机。所以，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农民获得的社会机会很可能决定他们最终获得的利益，甚至可能影响乡村的社会稳定，进而影响当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业机会、教育/培训机会、参与决策机会这三项二级指标可测量农户对社会机会的感知状况。

综上，共选取5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来衡量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对本地旅游发展福利的效用感知。详见下表1。

三、数据来源

本文对样本点的选取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肇兴拥有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2014年荣获“中国最具价值文化旅游目的地景区”称号，具有代表性；第二，肇兴侗寨近年来声名鹊起，旅游发展较快，旅游收入占当地

农民人均收入近40%(2017年统计数据),对周围农户生活影响较大;第三,在2018年春晚效应的推动下,肇兴侗寨景区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将来可能会给周边农户创造更多福利。鉴于此笔者于2018年初以肇兴侗寨景区为中心,对周围农户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和农户对当地旅游发展的福利感知,(包括经济收入、居住条件、公共环境、心理状况、社会机会)。其中,福利感知部分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法评判,(1,2,3,4,5)分别代表(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调研中,多数问卷采用随机发放完成,少部分问卷选择随机入户完成作答,最后共回收问卷235份。其中,对于全部选择同一个选项或是有关键问题项缺失的问卷都给予删除,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11份。在被调查的211名居民中,男性占比53%,女性占比47%;年龄方面,20岁以下的占比9%,20~29岁占比21%,30~39岁占比15%,40~49岁占比21%,50~59岁占比16%,60岁以上占比18%;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占比33%,初、高中占比62%,大专及以上仅有5%;职业方面,农民占比达到64%,公司职员占比18%,学生占比6%,其他职业占比12%。在全部调查样本中,直接参与旅游经营的人数约占56%,这保证了数据来源的可靠性。

四、指标权重确定

文中农户对当地旅游发展的福利感知属于主观性较强的研究问题,因此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层次分析法中将层级结构分为三级:目标层、准则层(一级指标)及方案层(二级指标)。 λ_{max} 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CI = \frac{\lambda_{max} - n}{n - 1}$, n 为每个指标的包含的因素个数, $CR = CI/RI$,其中 RI 可根据 n 值查表得到。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再详细论述层次分析法的计算步骤,直接附上指标权重的计算结果:

表 1 指标权重及一致性检验结果

指标		权重系数	λ_{max}	CI	RI	CR
准则层 B(一级指标)	经济收入 B_1	0.43	5.24	0.06	1.12	0.05 < 0.1 通过一致性检验
	居住条件 B_2	0.16				
	公共环境 B_3	0.05				
	心理状况 B_4	0.09				
	社会机会 B_5	0.27				
方案层 C(二级指标)	农业收入 C_1	0.10	3.04	0.02	0.58	0.03 < 0.1 通过一致性检验
	非农业收入 C_2	0.26				
	家庭纯收入 C_3	0.64				
	住房面积 C_4	0.17	2	0	0	0 < 0.1 通过一致性检验
	房屋结构 C_5	0.83	6.07	0.01	1.24	0.01 < 0.1 通过一致性检验
	空气质量 C_6	0.06				
	水体环境 C_7	0.06				
	自然景观 C_8	0.06				
	社区治安 C_9	0.50				
	基础设施 C_{10}	0.25	2	0	0	0 < 0.1 通过一致性检验
	社会文化氛围 C_{11}	0.07				
	幸福感 C_{12}	0.50	3	0	0.52	0 < 0.1

家庭/夫妻关系 C ₁₃	0.50				通过一致性检验
就业机会 C ₁₄	0.43				
教育/培训机会 C ₁₅	0.14				
参与决策机会 C ₁₆	0.43				

五、农户的福利感知评价

现有文献对福利水平的测度多数是在构建福利框架的基础上，采用数学建模的方式，以社会调查数据为支撑进行研究，如双因素分析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替代比例模型、Logit模型、结构方程模型、时间序列模型等。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测算农户的福利感知水平(方法介绍参考已有文献)。设准则层权重向量为P，方案层单因素权重向量分别为P1、P2、P3、P4、P5，由表1可知：

$$\begin{aligned}
 P &= (0.43, 0.16, 0.05, 0.09, 0.27) \\
 P1 &= (0.10, 0.26, 0.64) \\
 P2 &= (0.17, 0.83) \\
 P3 &= (0.06, 0.06, 0.06, 0.50, 0.25, 0.07) \\
 P4 &= (0.50, 0.50) \\
 P5 &= (0.43, 0.14, 0.43)
 \end{aligned}$$

设目标层评价矩阵为R，准则层单因素评价矩阵分别为R1、R2、R3、R4、R5，由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可知：

$$\begin{aligned}
 R1 &= \begin{bmatrix} 0.02 & 0.13 & 0.43 & 0.35 & 0.07 \\ 0.09 & 0.11 & 0.46 & 0.30 & 0.04 \\ 0.11 & 0.16 & 0.46 & 0.21 & 0.06 \end{bmatrix} \\
 R2 &= \begin{bmatrix} 0.02 & 0.05 & 0.25 & 0.46 & 0.22 \\ 0.04 & 0.09 & 0.41 & 0.38 & 0.08 \end{bmatrix} \\
 R3 &= \begin{bmatrix} 0.02 & 0.03 & 0.18 & 0.46 & 0.31 \\ 0.09 & 0.17 & 0.41 & 0.20 & 0.13 \\ 0.02 & 0.03 & 0.22 & 0.45 & 0.28 \\ 0.05 & 0.13 & 0.32 & 0.37 & 0.13 \\ 0.03 & 0.04 & 0.34 & 0.42 & 0.17 \\ 0.01 & 0.05 & 0.31 & 0.47 & 0.16 \end{bmatrix} \\
 R4 &= \begin{bmatrix} 0.02 & 0.04 & 0.25 & 0.35 & 0.34 \\ 0.02 & 0.03 & 0.25 & 0.39 & 0.31 \end{bmatrix} \\
 R5 &= \begin{bmatrix} 0.09 & 0.17 & 0.45 & 0.25 & 0.04 \\ 0.04 & 0.24 & 0.46 & 0.20 & 0.06 \\ 0.06 & 0.34 & 0.47 & 0.11 & 0.02 \end{bmatrix}
 \end{aligned}$$

则可得到准则层单因素模糊评价子集:

$$\begin{aligned}
 B_1 &= P_1 * R_1 = (0.10, 0.14, 0.45, 0.25, 0.06) \\
 B_2 &= P_2 * R_2 = (0.04, 0.08, 0.38, 0.39, 0.11) \\
 B_3 &= P_3 * R_3 = (0.04, 0.09, 0.32, 0.39, 0.16) \\
 B_4 &= P_4 * R_4 = (0.02, 0.03, 0.25, 0.37, 0.33) \\
 B_5 &= P_5 * R_5 = (0.07, 0.26, 0.46, 0.18, 0.03)
 \end{aligned}$$

根据准则层单因素模糊评价子集建立目标层模糊评价矩阵:

$$R = \begin{bmatrix} 0.10 & 0.14 & 0.45 & 0.25 & 0.06 \\ 0.04 & 0.08 & 0.38 & 0.39 & 0.11 \\ 0.04 & 0.09 & 0.32 & 0.39 & 0.16 \\ 0.02 & 0.03 & 0.25 & 0.37 & 0.33 \\ 0.07 & 0.26 & 0.46 & 0.18 & 0.03 \end{bmatrix}$$

得到目标层模糊评价集 $A=P*R=(0.07, 0.15, 0.42, 0.27, 0.09)$ 。提取评语集 $V=(1, 2, 3, 4, 5)$ ，可计算出肇兴侗寨农户对当地旅游发展福利感知的总体及准则层指标的评价值，见下表2。

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可知，肇兴侗寨农户对当地旅游发展的福利感知整体满意度为3.16分，处于“一般”水平。其中，各二级指标评分顺序为：心理状况(3.96) > 公共环境(3.54) > 居住条件(3.45) > 经济收入(3.03) > 社会机会(2.84)。农户对“心理状况”的评分最高，比较满意；对“公共环境”和“居住条件”评价中等稍偏上；对“经济条件”评价一般；对“社会机会”评价最低，处于“不满意”水平。

表2 目标层及准则层指标的综合评价结果

综合评价过程		综合评价值
目标层	农户福利感知： $E=A*V^T=(0.07, 0.15, 0.42, 0.27, 0.09)*(1, 2, 3, 4, 5)^T$	3.16
准则层	经济收入： $E_1=B_1*V^T=(0.10, 0.14, 0.45, 0.25, 0.06)*(1, 2, 3, 4, 5)^T$	3.03
	居住条件： $E_2=B_2*V^T=(0.04, 0.08, 0.38, 0.39, 0.11)*(1, 2, 3, 4, 5)^T$	3.45
	公共环境： $E_3=B_3*V^T=(0.04, 0.09, 0.32, 0.39, 0.16)*(1, 2, 3, 4, 5)^T$	3.54
	心理状况： $E_4=B_4*V^T=(0.02, 0.03, 0.25, 0.37, 0.33)*(1, 2, 3, 4, 5)^T$	3.96
	社会机会： $E_5=B_5*V^T=(0.07, 0.26, 0.46, 0.18, 0.03)*(1, 2, 3, 4, 5)^T$	2.84

究其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1) 旅游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人实现了本地就业、家庭团圆，有效提高了农户生活满意度；

(2) 为提升旅游环境质量，当地政府在改善村容村貌以及社区治安上做了很大努力，使社区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目前空气、自然景观、治安、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文化氛围尚可，但村寨蜡染污染了村内河水质量，令很多农户不满；

(3)为了发展旅游,寨内大部分建筑都属于重新搭建,且内部设施都比较现代化,住房结构更加合理,房屋舒适度得到有效提升,居住条件也得到了较好的改善;

(4)村寨居民对于旅游发展感知的动力在于经济因素,大部分农户表示旅游发展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但是在整个旅游开发及发展过程中,农户大都是出于低层次的“伪参与”或“象征性参与”,旅游发展带来的红利效应并不明显。

六、福利提升措施

(一)突出优势,巩固现有福利

调研结果显示,肇兴侗寨农户对基础设施、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幸福感这几项指标评价较高,表明当地旅游发展已经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目前,应当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继续加强农村公路建设,确保“组组通”,为农户出行和发展经济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加速推进民生水利建设,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和基本农田灌溉;警惕和改善耕地撂荒现象,不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技术和机械投入,引导农业多元化发展,稳固本地旅游发展的基石;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保障农户与游客共同的良好生活环境,继续提高农户生活幸福感。

(二)补齐短板,增加福利来源

多数地理位置较好的耕地、林地被占用是乡村旅游地普遍存在的问题,肇兴侗寨也不例外。对于当地农户来说,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资金支持,更需要就业岗位和技能培训。因此,增加就业机会、建立就业培训制度、鼓励农民兼业、将旧式农民转化为新型农民是提升农户福利的有效措施,具体包括:做好民族文化分区,避免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恶性竞争,深度开发具有侗族特色的旅游项目;明确自身文化特色,切忌照搬西江苗寨的规划思路,加强旅游品牌建设,探索特色旅游产品;增强侗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协同合作,加大宣传力度,有效吸引更多游客,形成市场的口碑效应和品牌效应,全方位增加、拓宽农户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渠道;培养能农能旅的多面手,有效提高农户的多途径谋生能力。

(三)多方保障,完善福利体系

对于农民来讲,失地即是失业,因此必须在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不断完善保障体系。具体措施有:加快土地确权,赋予农户完全产权,让其土地在转让、抵押等过程中享受合法权益;完善征地土地补偿安置制度,明确农户的主体地位,让农村征地市场化,由农户与政府谈判确定补偿标准;从实际出发,建立更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鼓励农民参与开发经营权,由农民变股民,让其拥有长久稳定的收入来源;对家庭经济状况较差、距离核心景区较远的农户家庭给予特殊照顾;完善集体决策参与机制,增强肇兴侗寨农户的民族自豪感,让他们从根源上保护民族旅游资源、支持本地旅游发展;构建内置金融合作社,解决外在金融机构因为管理成本过高而不愿意下乡为农户提供小额贷款的问题,依靠村寨内部力量帮助农户发展生产。

参考文献:

- [1] 张鸣鸣.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对农民福利影响研究——基于河南省的调查分析 [J]. 农村经济, 2014(8):7-11.
- [2] DWORKIN R. What is equality? part 1: equality of welfare [J].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81, 10(3):185-246.
- [3] 高进云, 乔荣锋, 张安录.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模糊评价——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J]. 管理世界, 2007(6).

-
- [4] 丁琳琳, 吴群, 李永乐.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福利变化研究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3):163-169.
- [5] 白描. 微观视角下的农民福祉现状分析——基于主客观福祉的研究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12):25-31.
- [6] 吴良德, 唐剑. 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的生态经济效应分析——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7, 38(12):183-187.
- [7] 何星.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中的生态化建设——以阿坝州为例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6(2):73-79.
- [8] 陈佳, 张丽琼, 杨新军, 等. 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 [J]. 地理研究, 2017, 36(9):1709-1724.
- [9] 吴蓉, 施国庆.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秩序的演化与重构策略——以W州X村为例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6(2):66-72.